

□ 东亚历史与文化研究

抗美援朝运动时期的社会动员： 历史动因、动员方式与现实启示

吕 健 计 娟

[摘要] 抗美援朝运动时期开展的社会动员，创造了一个总体性动员中国人民精神与实践能量的政治社会时刻。广大民众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以实际行动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提供了精神支撑和物质支持。新时代，社会动员也是凝聚社会力量和赢得民众支持的方式和手段。深入研究抗美援朝运动时期社会动员的历史背景，回溯历史动因，可从其动员方式中获得现实启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动员工作取得成功的根本保障；充分依靠人民群众主体力量是动员顺利开展的基础支撑；开展宣传教育工作是社会动员取得成效的重要手段。

[关键词] 抗美援朝运动；社会动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群众主体力量；宣传教育

[基金项目] 教育部社科司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专项（20JDSZK076）；辽宁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1年度课题（JG21DB422）；沈阳市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研究课题（SDSZ-2023-064）

[文章编号] 1009-3311(2023)04-0049-09

[作者简介] 吕健，沈阳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计娟，沈阳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研究生。（沈阳 110136）

DOI:10.16154/j.cnki.cn22-1025/c.2023.04.006

抗美援朝战争是在中美双方军事实力和其他综合实力极度悬殊的背景下进行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国之战，打出了军威、国威，确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让中国人重拾了民族自信。究其胜利的原因，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说：“因为我们的战争是人民战争，全国人民支援，中朝两国人民并肩战斗……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的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①中国广大民众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掀起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开展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动员，最终推动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胜利。

抗美援朝运动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相关的学术成果非常丰富。最具代表性的是范焕清的《支援抗美援朝纪实》，该书汇编了大量的文献史料，从赴朝慰问、战勤支前、增产捐献、拥军优属和防奸反特几个部分多方面、多层次和多角度地展现了全国各地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情况。^②国内大多数学者是从各地区开展的社会动员或者是具体的动员方式两个方面来进行研究。

①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01页。

② 范焕清：《支援抗美援朝纪实》，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年，第37—255页。

例如,江光亮以江西省为中心,在研究江西省抗美援朝运动兴起背景的基础之上,考察了江西抗美援朝运动概况,深入探究了运动开展的过程及各阶段的特点,同时考察了江西抗美援朝运动民众动员的组织情况。^①孙丹系统论述了抗美援朝宣传动员工作的四个时期及各时期的主要工作,详细阐述了宣传网络的构建、组织体系的运作和与其他活动相结合的动员过程,将宣传动员的整体面貌较为完整地呈现给读者,为相关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②也有一些学者撰写了研究综述,为后续学者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抗美援朝运动时期的动员范围之广,包含了各个阶层的社会民众;动员主体之多,既包括政治团体,也包括抗美援朝总会、分会等社会组织机构;动员内容之多元化,既有政治性的内容,也有经济、社会、军事等内容;动员影响之深远,不仅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而且稳定了社会经济秩序,巩固了新生的国家政权,为社会主义建设营造了良好的环境。由此可见,这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性动员。

本文以“抗美援朝运动时期的社会动员”为主要研究对象,拟用真实、完整、可信的文献资料将抗美援朝运动时期的社会动员的全貌完整地呈现出来,让人们了解中国共产党是如何领导并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力量以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取得胜利的,同时立足于全国性的研究视角,着眼于全国各地区,统筹分析抗美援朝运动时期的社会动员的历史动因、动员方式与现实启示,拓宽学术界对于抗美援朝运动的研究视域。“全党要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从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③回溯抗美援朝运动时期的社会动员的历史动因,通过分析各种动员方式,总结历史经验,这对新形势下凝聚社会共识、有效动员民众、调动党内外积极性来全面应对重大突发性危机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抗美援朝运动时期社会动员的历史动因

抗美援朝战争初期,民众对于抗美援朝战争的思想认识尚不统一,部分民众存在消极心态;军队的作战人员和战勤人员短缺;军事装备落后、物资补给紧缺,落后的国民经济无法满足战争的经济需求。为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取得胜利,必须开展一场凝聚民众共识、激发民众援朝热情的社会动员。除此之外,新中国成立之初社会形势十分严峻,反动残余势力尚未被肃清,新生政权的根基有待巩固;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黄赌毒问题、失业问题和乞丐流民问题等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落后的国民经济使新政权的建设困难重重,同时也不利于抗美援朝运动的开展。为有效动员民众支援抗美援朝战争,也为稳定社会秩序,更为巩固新生的国家政权,开展社会动员成为当时迫切需要进行的一项政治工作。

(一) 支援抗美援朝运动是进行社会动员的现实需求

第一,抗美援朝运动需要动员民众统一思想认识。关于抗美援朝运动,中国民众“思想认识很不一致”,存在畏战求安、恐美、崇美和亲美以及谣言传播下畏惧不安等心态。例如,部分民众甚至官兵认为“中国革命胜利得来不易,现在应该休息休息,集中力量搞自己的建设,少管邻居的事”。^④有的人说:“鸭绿江是鬼门关,有去无回”。^⑤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抗美援朝战争要想赢得民众的支持,首先必须开展动员活动统一民众的思想认识。

① 江光亮:《抗美援朝运动中江西省的民众动员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7—100页。

② 孙丹:《抗美援朝运动的全国宣传工作》,《军事历史》2020年第6期,第8—15页。

③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第8版。

④ 姜思毅:《中国共产党军队政治工作七十年》(第4卷),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第55页。

⑤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经验总结编委会:《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第22页。

第二，抗美援朝运动需要动员民众提供军事支持。建国初期，为减少财政支出，党中央决定对军队名额进行裁减，推动军人复员返乡发展生产。因此，抗美援朝面临着军队作战人员短缺的问题，急需加紧军队的扩充工作，动员广大群众积极参军参干，补充军队作战力量。除此之外，我军首次出国作战，地形不熟，后勤供应手段又极其落后，还面临着美军疯狂空袭的危险，且随着几次战役的展开，战局的扩大，补给线不断拉长。随着我军投入的兵力越来越多，军需物资的种类和数量消耗也越来越大，这就需要积极动员民众组建物资运输队，通过漫长的物资运输线，确保物资及时充足供应，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提供后勤保障。

第三，抗美援朝运动需要动员民众保障经济供应。朝鲜战争爆发，饱受战乱摧残的新中国各项事业百废待兴，财力、物力极度紧缺，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承担了巨大的经济压力。朝鲜战争刚刚爆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就做出向苏联订购武器装备的决策，以加快我国兵种的建设。^①同时，人民志愿军远赴前线作战，粮草和枪支弹药也需要进行大量购买，确保能够按时运送到前线。特别是在严寒的天气下，志愿军过冬的棉衣需要大量紧急赶制，这些军需物资的筹备需要大量的资金作为保障。然而，朝鲜战争爆发后，土地改革运动受到了阻挠，人民生产的积极性受到了打击，整体国民经济恢复建设受到了严重影响。特别是中共中央做出了抗美援朝的决策，军费的突然增加导致了社会“重物轻币”的心理重新抬头。新政权的财力物力匮乏，无法为抗美援朝战争提供保障，需要动员广大民众行动起来提供经济支持，为志愿军出国作战保障经济供应。

（二）建国初期严峻的社会形势成为社会动员的迫切需要

新中国成立之初，一方面，国民党反动残余势力和部分地主阶级、富农、恶霸等反革命分子进行扰乱破坏活动；另一方面，建国初期遗留下来许多旧的社会问题影响着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这些都不利于抗美援朝运动的开展。

第一，猖獗的反动活动阻挠了抗美援朝运动的开展。朝鲜战争爆发后，特别是仁川登陆以来，国民党遗留的反动势力和在土改中被打压的地主、富农等反革命分子狂妄嚣张，展开了猖獗的反动破坏活动，利用飞机在各地投掷“救济米”和反动传单、图画等，企图用谣言混淆民众视听，动摇民众心态，扰乱社会秩序。土改中被打倒的地主、富农，怀着根深蒂固的复辟思想，将希望寄托于“蒋美”身上，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地富反攻”行为，夺土地、夺屋舍、烧毁房屋、咒骂群众、收地租等活动愈加猖獗。除此之外，反动分子还进行了许多破坏基础和军运设施以及策划暗害、组织武装暴动等活动，严重威胁了新生政权的稳固，危害了社会秩序，造成了民众恐慌，增加了民众支援抗美援朝的心理负担，不利于抗美援朝运动的开展。

第二，遗留的社会问题增加了抗美援朝运动的难度。新中国成立初期，遗留下来黄赌毒、城市失业和乞丐游民等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一方面表明民众的思想境界有待提高，另一方面显示出建国初期部分民众的基本生存难以为继，身心健康有待加强，同时突出了社会风气亟待整治，社会秩序有待加强。由此可见，民众的基本诉求是能够维持生存和生活，有安定良好的生活环境。朝鲜战争的爆发，与民众的诉求相背离。社会问题造成的混乱的社会秩序是抗美援朝运动的客观阻碍，同时匮乏的精神和物质生活是民众面对抗美援朝心态消沉的重要原因，为动员争取民众支持抗美援朝增加了难度。

第三，落后的国民经济不利于提升民众的积极性。建国初期中国社会“一穷二白”，工业化水平远低于发达国家，尤其是重工业因长期战争的破坏而几乎完全瘫痪，广大人民群众的温饱甚至都成问题。朝鲜战争的爆发，加剧了国内经济市场的动荡，刚刚稍微稳定的国民经济秩序再度出现动荡，物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 1949—1978》第 2 卷（上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年，第 69 页。

价波动频繁,战略物资短缺,不法商人趁机囤积居奇和投机倒把的现象再度加剧,国内物价大部分出现了上涨趋势,更加重了民众的心理恐慌。在民众生活贫苦、最基本的生活都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很难为抗美援朝运动提供支持。

总之,民众对于抗美援朝的态度尚不统一,作战所需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短缺;猖獗的反动活动和遗留的社会问题均不利于抗美援朝运动的开展,亟须通过一场深刻的社会动员活动来统一民众的思想认识,激发民众的参与热情,动员民众积极地为抗美援朝提供支持。与此同时,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需要团结统一社会各阶层民众,凝聚社会共识,营造和谐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发挥民众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开展生产建设。可以说,抗美援朝运动时期开展的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动员既是抗美援朝运动的直接产物,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客观需求。

二、抗美援朝运动时期社会动员的动员方式

抗美援朝运动时期的社会动员按照动员目标基本可以划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为了支援抗美援朝战争。首先必须统一民众的思想认识,其次需要以具体的工作为内容,动员民众为抗美援朝提供军事支持、精神支持和物质保障。第二类是为了巩固新生国家政权。为了应对建国初期猖獗的反动活动、遗留的社会问题和落后的国民经济形成的严峻的社会经济形势,社会动员与土地改革运动和镇压反革命运动相结合形成联合式的动员模式,三者相辅相成,共同维护新生的国家政权。

(一) 为统一民众思想认识开展的抗美援朝宣传教育活动

宣传教育工作是将党的意志转化为人民群众意志的必要途径。

第一,采取多种宣传形式启蒙民众对支援战争的认识。其一,文字宣传。包括报纸、书籍、文章、漫画、板报、短诗等载体。其中报纸和刊物发行量大,是文字宣传最广泛的载体。据统计,1951年到1954年间,《人民日报》关于抗美援朝的宣传文字平均每月就达两万字。^①其二,口头宣传。宣传员将图书、报纸、《时事手册》和《宣传员手册》等材料通过报告、读报、讲演和座谈会等形式传达给群众。其三,实物宣传。各地抗美援朝分会通过举办展览会,将前线战士的作战工具和生活用品的一些照片展示给人民群众。其四,音像宣传。通过歌曲、电影、广播、街头剧等各种艺术形式向人民群众进行宣传。

第二,组织开展诉苦运动唤醒民众的爱国热情。抗美援朝运动时期的社会动员中,诉苦运动被定位为人民群众用自己切身体验来教育自己的方式。诉苦动员主要有三种模式。其一,回忆与对比式控诉。主要表现为“以苦引苦,使群众由仇日而仇美”和“从控诉蒋匪、地主阶级的罪恶着手,联系控诉美帝”两种模式。据当时反映,这种控诉模式是最能激起广大群众对美帝国主义的愤恨和对祖国的热爱的一种动员模式。其二,直接式控诉。矛头直接指向控诉的最终对象——“美帝国主义”,着重于直接批判与揭露“美帝暴行”。^②一般民众大多是对自己亲身经历或见闻的美帝暴行进行控诉,例如,工商界主要是控诉美国帝国主义对于我国的经济侵略和摧残;文化界主要是控诉美帝国主义对我国文化的入侵和毒害。其三,自我控诉模式。在控诉会上,由过去存在“亲美、崇美、恐美”心理的人在自我“检讨”和“坦白”中,实现“自我批判”和“自我教育”。

第三,开展游行示威扩大宣传教育的影响范围。游行示威是认清帝国主义本质,揭露帝国主义阴谋,增强抗美援朝力量的运动。示威的主要政治诉求是反对美国武装日本,与日本单独媾和,防止战局进一步扩大;主要目的是拥护世界和平理事会关于缔结和平公约宣言并积极签名。东北地区作为抗

^① 张涛:《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史》,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6年,第61页。

^② 侯松涛:《诉苦与动员:抗美援朝运动中的诉苦运动》,《党史研究与教学》2012年第5期,第34—44页。

美援朝的大后方，游行示威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游行示威运动不仅扩大了宣传教育的影响范围，充分激发了民众的爱国主义热情，增强了抗美援朝的力量，展现了人民群众抗美援朝的磅礴斗志，同时进一步推动了抗美援朝运动的深入开展。

（二）以具体工作为内容开展的抗美援朝支前行动动员

第一，为抗美援朝提供军事支持开展的参军参干和战勤支前运动。中共中央于1950年12月发布了《关于动员青年学生和青年工人投考军事干部学校的通知》，^①号召广大青年踊跃参军参干。在党和政府的号召下，全国各地掀起了参军参战的热潮。东北地区作为抗美援朝的大后方更是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辽东省共有1.4万余名青年学生投考各种军事干部学校。^②中国共产党在动员民众参军参干的同时，为保障前线的战勤服务，各地展开了战勤支前的动员工作。与朝鲜一江之隔的辽宁地区作为前哨阵地，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组织开展战勤动员，主要包括组织担架队，组织汽车驾驶员、技术工人、医务人员、厨师、翻译人员、船员、石工、木工等专业技术人员从事与战争有关的专业事务，组织民工修建机场、铁路、公路、军用仓库、战备工程等国内国防基础设施。这些都为支援抗美援朝战争贡献了重大力量。

第二，为抗美援朝提供精神支持开展的拥军优属和赴朝慰问运动。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拥军优属主要表现为节日慰问、经济救济、提高政治地位、代耕助耕和帮助就业五种形式。拥军优属活动进一步提升了民众的参军热潮，为抗美援朝提供了军事支持。与此同时，党领导人民普遍开展了慰问志愿军和朝鲜人民的活动。在抗美援朝运动期间，全国曾三次派出赴朝慰问代表团，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军民演出了精彩的文艺节目，分发了慰劳金和慰问品等慰问物资，并且经过慰问团归国对人民志愿军英勇事迹进行了广泛宣传，全国民众备受鼓舞，爱国主义热情更加高涨。在党和政府的积极号召下，全国各地掀起了往朝鲜前线寄送慰问袋、慰问金、慰问信的热潮。在1951年1月当月，各地寄慰问金人民币14万余元，慰问信45万封，慰问袋36万余个，慰问品61万余件。^③

第三，为抗美援朝提供物质支持开展的捐款捐物和增产节约运动。1951年6月1日，抗美援朝总会发出了《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军属的号召》，同日，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开展爱国公约等项运动的指示》要求：捐献武器运动，必须与增加生产或其他增加收入运动结合起来。^④此后，抗美援朝捐献运动和增产节约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展开并取得了很大成效。截至1952年5月底，东北地区捐款6525.08万元，可购战斗机435架；华北地区捐款6795.06万元，可购战斗机453架；华东地区捐款21540.67万元，可购战斗机1436架；中南地区捐款13357.84万元，可购战斗机890.5架；西南地区捐款4471.22万元，可购战斗机298架；西北地区捐款1365.41万元，可购战斗机91架；内蒙古捐款465万元，可购战斗机31架。其他地区和个人捐款1132.5万元，可购战斗机75.5架。全国各界人民总计共捐款55650.37万元，可购战斗机3710架。^⑤在增产捐献运动中，工人、农民、职工、学生等各社会群体都表现得十分积极，许多妇女同志主动把自己的金银首饰捐了出来，以支援抗美援朝运动。这一运动，不仅为朝鲜战场前线胜利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而且为祖国创造了巨大的财富。

①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22页。

② 范焕清：《支援抗美援朝纪实》，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年，第43—44页。

③ 孟红：《它们见证朝鲜战争的烽火往事》，《党史纵览》2010年第12期，第35—38页。

④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5》（第6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85页。

⑤ 姜廷玉：《揭秘：全国人民支援抗美援朝共捐出多少飞机？》，<http://www.crt.com.cn/news2007/News/shmw/1010251544447FFAIK90F8597K7I2I5.html>。

(三) 与建国初期其他运动开展联合式的动员

第一, 社会动员与土地改革运动开展联合式的动员。朝鲜战争的爆发特别是抗美援朝的开展, 改变了建国初期中央对于土地改革持有的稳健态度, 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土地改革运动的进程, 并对土地改革运动的部署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土地改革运动的顺利开展, 有利于激发农民的积极性, 增加农业收入, 为抗美援朝运动提供物质支持。因此, 抗美援朝运动时期的社会动员与土地改革运动相联合开展动员。其一, 联合土地改革运动开展时事宣传。土地改革之前, 农民普遍遭受蒋介石、日寇和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 是土地改革让农民翻了身, 获得了胜利的果实。通过控诉的方式, 将国民党反动派、日寇和地主阶级与美帝国主义联系起来, 推动农民由控诉地主恶霸、国民党反动派到控诉美帝国主义。这种密切联系群众切身利益与经验, 由远及近、由浅入深的方式, 善于激发群众意志并将其转化为自觉的行动。其二, 将群众反美爱国的情绪与当前的实际工作密切联系起来。将高涨的爱国主义情绪投向加强国防建设、拥军优属、参加国防军、慰问志愿部队以及开展春耕生产等具体行动中去, 形成广泛的群众性运动。土地改革运动为抗美援朝运动时期的社会动员提供了有效的利益诱导支撑, 社会动员的开展也有助于土地改革运动的顺利进行。这种内部利益驱动与外部力量推动的结合, 构成了抗美援朝运动民众心理能够迅速转变的强大动力。

第二, 社会动员与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展联合式的动员。面对朝鲜战争爆发后更为严峻复杂的形势, 中共中央改变了过去保守的态度, 开始着手布置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的工作。朝鲜战争的爆发, 是镇压反革命运动由保守之势走向大规模兴起的关键刺激因素。同样, 镇压反革命运动所具有的对社会超强的整肃能力又必将有利于抗美援朝运动的进行。其一, 将朝鲜战争爆发后国内“谣言猖獗”问题的处置作为镇压反革命运动的重要内容。党中央关于惩治反革命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在相关精神的指导下, 严厉打击谣言制造者和散布者成为当时镇压反革命运动的重要内容。这种对制造和散布谣言者予以严厉的打击对展现党和政府的权威性、统一民众的思想认识产生了积极推动力。其二, 将镇压反革命作为抗美援朝运动时期的社会动员的重要内容之一。社会动员工作中, 许多群众订立的爱国公约, 不论个人的、村的、组织的都有协助政府镇压反革命运动一条。这进一步深化了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开展, 同时巩固了新生的国家政权, 维护了社会秩序, 反推了社会动员工作的顺利开展。

三、抗美援朝运动时期社会动员的现实启示

抗美援朝运动时期的社会动员能够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在于坚持党的正确领导。新时代的社会动员工作依然要坚持和加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 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 提升民众对于党的信任度。人民群众的磅礴力量是社会动员取得成功的有力保障, 新时代的动员工作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 筑牢动员的群众基础。宣传教育工作是抗美援朝运动时期社会动员取得成效的重要手段, 新时代要继续加强宣传教育工作, 有效凝聚社会共识, 动员民众真正参与到动员实践中来,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新成就。

(一)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动员取得成功的根本保障

“党政军民学, 东西南北中, 党是领导一切的。”^① 抗美援朝运动时期的社会动员正是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 通过宣传教育活动统一了民众的思想认识, 激发了民众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热情; 通过开展参军参干、拥军优属和捐款捐物等具体的活动有力地动员民众为抗美援朝提供精神与物质支持; 同时在党中央的领导下, 与建国初期的其他运动相结合, 巩固了新生的国家政权。由此可见,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这是动员取得成功的根本保障。新时代的社会动员工作依然要充分发挥党的主体

^① 习近平:《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党员之友》(新疆)2021年第12期,第4-9页。

领导作用，通过提升政治形象、增强执政本领来树立党的权威，增强党在动员工作中的领导水平，这有助于增强民众对党领导社会动员工作的信任，从而有利于动员工作顺利开展。

第一，牢固树立党的政治形象。其一，加强思想建设，加强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持续巩固和提升党的权威性。坚持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提升思想境界、加强党性锻炼，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在思想和行动上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以身作则号召民众积极参与到动员工作中。其二，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系列主题教育活动。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人民群众至上的执政理念，牢记人民群众最关心的事，用心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真正把“一切为了人民、为了一切人民、为了人民一切”三者有机统一起来。只有这样，才能赢得民众的信任与支持，顺利动员民众参与到动员工作中，并有效引导民众将动员的理念、号召和政策等真正落实到生活和生产的实际行动当中。其三，加强党的政治生态建设。经常性地开展整风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党员坚定政治信念，坚守政治理想，增强党的政治自觉和政治清醒，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只有这样，才能经得起人民的考验、对得住人民的信任，赢得人民群众的认可，才能深层次地巩固党执政的群众基础。人民群众只有真正信任党的领导，才会坚定不移跟党走，积极响应党的动员号召，以实际行动支援党的动员工作。

第二，要不断提高执政本领。其一，增强调查研究能力。“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① 抗美援朝运动时期开展的宣传教育活动就是经过广泛的社会调查，在了解民众心理动态的基础上开展的活动。新时代的动员工作要自觉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方法论来观察社会动员工作面临的新环境，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做好调查研究，把握新时代动员工作的新特征，聚焦动员的重点难点问题，了解民众对于动员工作的态度以及对于国家政策的认可度和接受度。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不同的群体有针对性地开展动员工作。其二，增强分析决策能力。新时代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局势，党员干部要深入了解社会动员面临的诸多风险、考验和挑战，要不断提高观察事物、分析问题的能力。在复杂的局势中，捋清动员工作中的大事要事和急事难事，在分清各项工作轻重缓急的基础上，科学果断地做出决策，各个击破。只有决策正确，才能领导动员民众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其三，增强协调沟通能力。新时代社会动员的动员对象多元化，不同阶层的民众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各阶层的利益诉求难免发生冲突，这就要求党员干部要有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提倡民众的事要商量着办，在协商互动中赢得各方民众的支持。只有党的政治形象良好，执政本领过硬，才能在民众中树立起权威，才更容易在动员工作中将民众号召起来。

（二）充分依靠人民群众主体力量是动员成功的基础支撑

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力量，充分依靠人民群众的主体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获得最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并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抗美援朝运动时期的社会动员正是由于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力量，动员广大民众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提供物质支撑和精神支撑，才使得这场实力悬殊的战争取得胜利。新时代社会动员工作要充分依靠人民群众的主体力量，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

第一，加强人民群众的意识形态教育。其一，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引导群众，提升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水平，教育引导人民群众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在民族大义面前坚定政治立场，坚定不移跟党走。同时，加强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新时代，只有铸牢各族民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激发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心理共鸣；只有增强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才能在国家民族危难面前，众志成城、携

^①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纲要》，北京：学习出版社，2019年，第42页。

手并进地参与到党的动员工作中来,以磅礴的力量推动国家强盛和民族复兴。其二,加强民众自身道德建设。构筑统一的社会意识形态是开展动员工作的前提和基础,提升民众的自身素养是统一社会意识的内在要求。要加强科学文化教育,增强民众对于事物的认识水平和认识能力,引导其在动员工作中做出科学准确的道德判断;增强民众的责任意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美德,提升民众对个人、社会和国家的责任感;加强民众的法治意识,明确个人的权利义务,了解法律规定的“可为”“不可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正确参与到动员活动中来。提升民众的认识水平、判断能力、责任意识和法治意识,有利于更好地统一社会意识,凝聚共识,推动动员工作顺利开展。

第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抗美援朝运动时期的社会动员与土地改革运动相结合,并鼓励民众增产节约,保障了民众基本的生活需求。新时代的社会动员也要切实保障民众的利益诉求。其一,动员工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保障基础民生,从群众最关切的根本利益入手。集中力量加强民生建设,确保民众在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等方面的基本需求。做好兜底保障工作,消除民众的后顾之忧,同时,积极回应群众诉求,群众利益无小事,每一件事都关系群众的根本利益,要用“真心”“热心”“责任心”践行“初心”。只有切实解决了基本的民生问题,民众才会更好地响应党的号召。其二,保障民生的过程必须努力实现公平正义。公平正义的实现不仅很大程度影响着民众生产建设的积极性,更影响着民众对于党的领导的认可度和信任度。社会动员的过程中要建设合理公正的收入分配制度和利益协调机制,采取各种措施努力缩小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其三,满足人民群众的新需求。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新时代的动员工作,应该兼顾到人民群众的新需要,坚持一切工作要从群众利益出发,完善法治建设、创建美好环境、加强社会保障、尊重人民群众,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的品质化需求。这既体现了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也增强了民众对党领导的信心和决心,同时激发了民众响应党的号召,燃起积极参与到动员工作中去的热情。

(三) 开展宣传教育工作是社会动员取得成效的重要手段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抗美援朝运动时期的社会动员正是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消除了民众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消极心态,统一了民众的思想认识,为后续实际工作的开展奠定了思想基础。新时代的社会动员工作依然要将宣传教育工作视作动员的重要工作。

第一,确立宣传教育的工作方向。其一,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社会动员工作要坚定不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理论指导,面对任何情况都不能有所动摇。当前社会思想意识复杂多样,一些西方错误思潮充斥着互联网、新媒体、自媒体等平台,妄图挑战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蛊惑人心,竭力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针对这些情况,社会动员的宣传工作要牢牢把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舵头,用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领社会动员的各项工作。其二,唱响主旋律,加强政治舆论的引领力。新时代党的社会动员工作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下进行的,因此要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贯穿于历次的宣传教育活动之中,激发各族人民的信念感,鼓舞全国人民振奋起来,朝着共同的愿景一致向前。其三,宣传教育工作还要积极对外宣传党的理念,增进世界对于中国的了解,不断提升中国的话语权和在世界舞台的地位。面对污蔑和诽谤时,必须挺直腰杆回击,用数据和事实逻辑去证明,用现实去回击挑战,牢牢掌握政治意识形态领域不被侵蚀,展现宣传思想工作的时代强音。民众对“中国梦”的深入认同和良好的舆论环境有利于社会动员的有效开展。

第二,拓宽宣传教育的实践路径。其一,进行多途径泛化宣传。如报纸、电视、座谈会、宣讲会、广播、标语、报刊、画集、歌谣、戏剧、演讲、网络直播等宣传方式可以最大限度地覆盖各种信息获取渠道的受众,最广泛地将党和政府关于动员工作的政策指令传达给各方民众。其二,宣传教育方式要与时俱进,利用互联网技术传达党的方针政策,加强舆论引导,体现时代化、信息化与高效化。一方面在微博、微信、抖音等互联网平台注册官方账号,以影视、短视频等为载体,普及党的方

针政策、宣传社会形势、及时发布动员的相关信息，使民众潜移默化地接受共产党的号召。另一方面，利用互联网进行舆论监测，实时关注民众对于社会动员的思想动态，坚决抵制并遏制错误思想的传播，予以正确的舆论引导。其三，树立宣传模范。“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精神的力量是伟大的。”^①很多民众对党和政府的动员持有观望态度，新时代的动员工作需要树立表现突出的典型事例，加大模范事迹的表彰和宣传力度，以精神的引领带动民众的参与热情，推动动员工作顺利开展。其四，对于不同的动员对象采取有针对性的动员方式。对于教育工作者可以利用学术刊物、报纸等进行宣传；针对商人可以制定有利的商业政策，营造良好的从商环境，以此激发其参与热情；对于农业和工业生产者，可以维护其根本利益，发布政策号召，鼓励生产经营，激发其生产积极性，以实际的生产活动响应党的动员号召。

第三，组建专业的宣传教育队伍。其一，要高度强调宣传队伍的政治建设。新时代，各种社会思潮层出不穷，利益诱惑纷至沓来，面对如此情形，社会动员的宣传队伍应该具备更高的政治素养，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知识，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看待问题，增强对于党的动员决策的政治认同，提升宣传教育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同时，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宣传的指导思想，善于用党的最新理论成果，向群众宣传、阐释党的动员政策。其二，提升宣传队伍的业务水平。要增强调查研究能力，这是宣传工作者的基本素质。在开展宣传教育的过程中要善于观察民众的反应，对于共性存在的问题及时展开调查研究，将总结出的原因报告及时反馈，在此基础上根据上级领导的政策及时调整宣传的内容和方式。要增强学习能力和表达能力，增强专业知识和其他知识的储备量，熟稔地理解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同时要清楚地掌握民众的心理状态，最终在此基础上采取适当的、便于民众接受的方式开展宣传教育，将党的意志转化为民众的意志。要提升互联网的运用能力。新时代下宣传工作者要利用已经掌握的动员理论知识，合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增进与民众的互相沟通与交流，发挥网络动员的有效功能。

四、结语

抗美援朝运动时期的社会动员是为支援抗美援朝战争，也是为巩固新生的国家政权而开展的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动员运动。社会动员通过各种宣传教育活动消除了民众关于抗美援朝的消极心态，统一了民众的思想认识，激发了民众的参与热情，为动员民众以实际行动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奠定了思想基础。全国民众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参军参干、战勤支前、拥军优属、赴朝慰问以及捐款增产运动，为抗美援朝战争提供了极大的精神支持和物质支援，保障战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除此之外，这一时期的社会动员与建国初期的其他运动相互联合，推动了建国初期各项建设工作的顺利开展。回溯抗美援朝运动时期社会动员的历史动因、分析其动员方式，对于新时代的动员工作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新时代的社会动员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不断增强党的政治形象和执政本领，树立党的权威，增强民众对党领导的信心；要充分依靠人民群众主体力量，不断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意识形态教育，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积极引导民众实际参与到动员中来；要重视宣传教育工作的开展，要把握正确的宣传方向，拓宽宣传教育的实践路径，通过专业的宣传教育队伍来有效凝聚社会共识，推动社会动员取得更大成效。

[责任编辑：张京梅]

^① 冉亚辉、包翠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革命英雄主义重要论述的德育价值研究》，《教育理论与实践》2023年第17期，第15—18页。

the great founding leader of the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was an inevitable historical result of the counter-Japanese national independence and liberation struggle since the 1820s and an undoubtedly inevitable choice of the Times for the new development of the Korean revolution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40s.

Key words: the Northeast Counter-Japanese United Army; the returning Korean team; General Kim Il-sung; new Korea

Social Mobilization in the Resist–America–Aid–Korea Movement: Historical Motivation, Mobilization Mode and Practical Inspirations

Lu Jian, Ji Juan (49)

Abstract: The social mobilization during the Resist–America–Aid–Korea Movement created a moment of political society that collectively mobilized the spiritual and practical energy out of the Chinese peopl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masses of the people provided spiritual and material support for the victory of the war. In the new era, social mobilization is also a means to gather social strength and win public support. Practical inspirations can be obtained from the in-depth research on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motivation of the social mobilization during the Movement as follows: adhering to and strengthening the overall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is the fundamental guarantee for the success of mobilization; fully relying on the masses of the people is the basic support for smooth implementation; carrying out propaganda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means for effective mobilization.

Key words: the Resist–America–Aid–Korea Movement; social mobilization;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masses of the people; propaganda education

On the Internal Logic of Jeong Ruoyong's "Right of Autonomy" and "Good and Evil"

Gao Mingwen, Cui Meiling (58)

Abstract: Jeong Ruoyong's right of autonomy is usually interpreted as Ricci's free will or Kantian's moral self-disciplin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is that the former emphasizes that the right of autonomy is a person's ability to freely choose between good and evil. The latter highlights the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is the ability of man to overcome evil. The common point is that both presuppose the existence of absolute good and evil, as well as the transcendental ability to judge good and evil objectively. However, through hermeneutics' analysis of the inner logic of autonomy and good-evil in the text, it is found that (1) Jeong's autonomy is the ability to plan actions for good. Neither it acknowledges the existence of absolute good and evil, nor does man have the ability to judge absolute good and evil; (2) evil stems from "not thinking"; and (3) good is "a contextual act". This also means that Jeong did not adopt the method of introducing Western thought directly in the process of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ism, but actively carried forward the essence of Confucianism.

Key words: Jeong Ruoyong; "right of autonomy"; good and evil; sincerity

The Chinese Images in Russian Emigrant Poets' Writings in Harbin

Yan Wenying, Liu Yanping (67)

Abstract: With the massive emigration to China from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to the middle of the 20th century, Russian emigrant poets in Harbin wrote a large number of immortal poems, which contain unique Chinese customs and complex Chinese emotions. Various images such as Confucian scholars, beauties, laborers, drug addicts, common people, and "red beards" (the gang robbers) were depicted by the emigrant